

# 文创产业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路径研究

□中共济宁市兖州区委党校 闫景沛 中共济宁市委党校 谢瑞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生态产品实现其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价值的过程,始终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极其重要的一环。而文化创意产业又可通过“修复力”“体验力”,其形态包括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并实现多维价值的过程,即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求的生态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将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面对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实际,推动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 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意义重大

生态产品主要指生态系统为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提供且被使用的货物和服务贡献,其形态包括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并实现多维价值的过程,即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求的生态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将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面对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实际,推动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 二、文创产业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核心机制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和人文经济,兼具知识性、绿色性、创新性、渗透性特征,可通过“生态修复力”“产品内涵力”“景观体验力”三大核心机制,打造生态产品,促成其多维价值实现。

### (一)聚焦“修复力”:文创营造赋能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对有待治理的杂荒地、旧矿山、老村庄、废坑塘等,通过绿地景观、文旅景区规划建设,实现“点上成金—扩绿增绿”式生态修复;通过数字创意、文创消费、研学体验等业态布局,腾退老旧厂区落后产能,优化区域环境,实现“腾笼换鸟—降碳减污”式生态修复,使自然资源获得调节服务价值。如枣庄市中兴煤矿“国家矿山公园”,传承百年煤矿历史、弥补生态损失,通过环境更新、生态修复和文化重现等手段,在充分保护矿业遗迹、维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打造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工业旅游与生态旅游相结合的中兴

煤矿“国家矿山公园”。公园的建设改善了周边地区群众的生活环境,带动了餐饮、购物等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丰富了城市旅游景区结构,对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废弃矿山水资源生态修复开发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 (二)聚焦“内涵力”:文化开发赋能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对农林、牧、渔等特色生态产品,借由品牌创意、直播带货等环节,将文化特色元素和生态特质信息融入产品包装、品牌和消费场景,提高生态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以文化附加值带来的高利润优化生态供给资源的利用效益,释放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的多元价值。如安丘市将文冠果作为林业重点产业项目推进,不断扩大文冠果种植规模,拉长产业链条。重视深挖文冠果药用价值、观赏价值,提高文冠果的文化附加值。安丘市文冠果特色经济林产业正努力发展为当地既能实现绿水青山,又能创造金山银山的生态富民产业。

### (三)聚焦“体验力”:文旅体验赋能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对本身具有优美的自然条件、良好的自然资源和旅游开发潜力的地区,如山区、湖泊、湿地等,进行规划设计、文旅开发,从生态旅游产业得到的收益又反哺生态环境的再美化,释放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本机制的实践以生态景观文旅体验模式为主。如日照市五莲县叩官镇董家楼村借助良好的山水资源和文化底蕴,通过实行“党支部+乡村旅游”模式,大力发展大樱桃、猕猴桃、民宿等特色农业和旅游产业,逐渐建成以精品采摘、风景观光、绘画写生、登山徒步和农业休闲度假为主体的生态旅游度假村,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互促共进。

## 三、文创产业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创新路径选择

不同地域可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培育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引导其参与当地生态资源的保护

和利用,激发“生态修复力”“产品内涵力”“景观体验力”,打造各具特色的生态产品,促进相关产品实现经济、社会等多维价值,从而为区域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 (一)以“绿地空间”规划营建打造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释放其多维价值

绿化优化废旧厂区、村居坑塘等空间,营造服务类生态产品。聚焦废旧厂矿创意运营,规划引育文创产业园、工业研学、数字经济集聚区等新业态,助力腾笼换鸟,生态更新。尤其重视对保存较好且环境亟待绿化优化的工业遗产、旧厂区园区的系统摸排工作,梳理总结工业文化遗产资源,规划设计工业遗址公园、工业研学基地、现代风格时尚创意园区,鼓励文化创意、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商贸服务、时尚餐饮、旅游娱乐等企业入驻,逆转老旧厂房对周边环境的负面影响,推动老厂房焕新“绿”,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整体摸排废旧坑塘、滩涂、采煤塌陷地等空间,发展湿地园林、大地艺术、野趣露营,促进相关区域绿化美化,推进生态调节能力修复。重点排查镇镇荒地坑塘,多用绿色步道、互动装置、艺术景观、建筑创意等元素,优化杂草荒地、河滩滩涂,推动“口袋生态公园”在村居社区落地,增绿扩绿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 (二)以“土特产”创意营销打造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释放其多维价值

全面梳理区域农、林优质生态产品的生态特色和地域特色,将产品背后的水土优势、生态特质和蕴含的历史故事、文化内涵融入生态产品包装、品牌和消费场景,打造原产地品牌形象,策划生态景观直播带货,深度提高地方特色生态产品文化附加值。做深地域性生态文化内涵和地域文化内涵,设立富有的人文气息、市场元素的IP标识系统,打造区域生态优质产区乡村土特产品品牌库,将区域性优质生态产区土特产进行集中打包电商直播、创意营销。加强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整合农业农村、文化旅游、商务物流等职能部门,集聚品牌包装、创意设计、社媒运营等专业平台团队资源和高等院校乡村振兴工作站力量,进一线、走基层、下乡村,构建土特产生

态品质提升打造生态链,提高乡村供给类生态产品的生态品质和独特的文化附加值。

### (三)以“生态文旅”观光经济打造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释放其多维价值

推进生态特色与人文特色相结合,依托各地海洋、湿地、林地、水面等自然资源优势,发展户外公园、露营基地等生态观光项目,尤其重视深挖文化内涵,讲好山水人文故事,打造富有地域特色的生态文旅新模式,形成地方特色文旅新名片。探索打造生态文旅创新试验区,市场化、精细化、高标准提升区域生态旅游景区品质,在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政策、切实保护绿水青山承载力的情况下,核算区域内山林、湖泊等流域生态产品总值(GEP),探索模块化分包,公开向文旅公司招商,创设林地音乐节、水上运动乐园、垂钓湿地公园、户外露营基地、山水乡村民宿、海鲜餐饮街区等特色经营项目,推动生态景区精细化打造建设,以生态产业化促进文旅融合,释放生态资源文化旅游价值功能。同时注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等人文智慧、养生之道,与相关历史故事、佳话轶事,以及区域性生态观光等自然观光旅游场景紧密融合,创设新场景、新产品、新服务。如创新山林湖海人文康养项目,重走古人山水游记徒步项目等,提升生态文旅人文内涵。鼓励文化旅游公司、非遗企业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乡村建立联合创新联盟,开发区域生态资源,做强乡村毗邻片区生态文旅项目,推动乡村振兴与绿色低碳转型相互赋能,共富乡村。

## 结语

综上所述,立足各地生态禀赋与文化底蕴,以文创赋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既能激活生态产品经济、社会、文化多维价值,又能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本文系2025年度济宁市党校系统“揭榜挂帅”重大招标项目“以文扩绿:文化创意产业赋能济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 办公室高效协调运转模式构建探讨

□娄底市风景园林中心 周冠

办公室是单位运转的中枢神经,办公室协调效能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单位工作效率和质量。基层单位办公室目前存在职责不明、信息传递不畅、执行不力等现实问题,从而造成行政效率低下。本文以娄底市风景园林中心工作实际为出发点,对办公室协调运转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从职责体系、信息流程、制度建设等角度出发,提出构建高效协调运转模式的实施途径,为提高办公室综合协调能力提供可行的实践方案。

## 一、办公室协调运转的现实困境分析

办公室是单位运转的枢纽,其协调功能在实际运行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都是职责不清、信息不畅、制度执行不到位,这些都会影响到整体工作效率及组织运行效率。

一是职责体系界定不清。办公室工作具有综合性强、涉及面广的特点,但是大部分单位存在着岗位职责不清、责任边界不明的现象。由于缺少明确的职责清单和工作指引,当需要多个岗位或者跨部门协作完成任务的时候,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局面很难形成,容易造成工作推诿、责任不明的情况。由于没有责任划分的标准,在需要多个部门协作的项目中容易出现工作推进时重复劳动或者管理真空的现象。

二是信息流转机制不畅。目前很多单位仍然使用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缺少高效的、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以及信息传递标准,由此导致信息传递效率低,甚至在传递过程中容易产生信息失真、延误乃至丢失的现象。由于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着信息壁垒,跨部门协作中无法形成有效的信息互通,增加了协调成本和时间成本,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 增强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

□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田代洪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重要且艰巨的任务。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组成部分,增强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从而增进民族地区民生福祉,提高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生活品质,这也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的题中之义。将增强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统筹纳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之中,一方面,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初心使命的践行和对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原则的坚守;另一方面,也明确了民族地区的民生工作、公共服务建设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当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并给予了大力支持,促使其不断发生优化。在此背景下,应始终紧扣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从“扩”范围、“优”机制、“强”效能三个方面优化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路径,不断增强其可及性,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

## 一、“扩”范围,推进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全域化发展

首先,以县(市、旗)为核心,立足民族地区城乡发展,统筹和分析基本公共服务的实际需求,然后依托现有的平台和载体将优质资源有计划、有秩序地转移到偏远乡、薄弱村落等落后地区。通过精准转移,使得落后地区能够获得最基

本的公共服务可及性兜底保障,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从城乡和地域上缩小民族地区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资源承载能力上的差距。

其次,在全领域发展中应始终坚持“共享共富”的理念,基于资源、分配、参与主体等维度进一步完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行性要素,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同时,针对贫困落后地区需加大财政投入,重点解决各方面的发展障碍,如教育、上学教师薄弱、医疗上诊疗水平低、就业上信息不畅通等,进而促使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利。此外,可借助持续优化机制,明晰权责、调整财权等方式将跨地域的相关优惠政策举措落到实处,即劳动就业政策、资金流转政策、社会保险政策,并进一步细化政策使其更加具体,以更好地实现统一规划和统筹协调,避免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体系在跨地域中出现各自为战、服务脱节的现象。

## 二、“优”机制,提升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精准高效性

首先,进一步完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供给机制和成本分摊机制。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要立足公共服务价值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制定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供需次序标准,然后合理化制定不同地域的服务资源配置,避免其出现集中化。从供给侧视角来看,该分配机制

将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次序和人民最关注、最实际、最直接的需求紧密联系,使得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更加具有精准性、高效性。从供给侧视角来看,形成了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供给合力。

其次,应进一步健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质量监督和保障机制。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制度和相关政策制定的主导者,不仅要明确自身职能分工和各部门的具体责任,还应做好监督、反馈的工作。通过多种方式加强自我约束,如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清单制度、创新自我监督形式等,为服务的落实提供良好的保障机制,避免其流于形式、表面化。

最后,应充分发挥各族人民、各相关利益方在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积极作用。通过推动民族地区相关主体与社会保障政策间的良性互动,避免政策脱离群众和主体被动接受,明确提出三项制度,如民主评议决策制度、民主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积极调动各相关主体参与其中,形成多元参与监督的格局,增加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机制的弹性约束。

## 三、“强”效能,增进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数据驱动力

首先,应构建民族地区“互联网+公共服务”

的制度保障。必须把协调模式固化为可以执行的制度规范体系。跨部门协调事项管理办法、重点工作任务督办实施细则等主要制度。这些制度要互相衔接,与单位现有的管理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挖掘信息化平台的功能,把制度要求嵌入线上流程环节中,实现制度流程化、流程信息化,减少人为操作的随意性,保证协调工作始终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为高效协调提供刚性保障。

文化土壤。要大力培育以“协同共生”为内核的新型组织文化。领导干部自身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重视协调的规则,在各种场合都强调协同的价值。对主动协作、补位担当的行为予以公开表彰,对本位主义、推诿塞责的现象及时加以纠正。以设立协作奖项、组织跨部门活动、宣传成功案例等方式,于潜移默化中培养员工的集体认同感和大局观。最终把协同理念变成全员的行为自觉,为高效协调赋予最持久的软性支撑。

## 结语

综上所述,办公室高效协调运转模式的创建,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职责划分、信息流转、督办闭环、人员素质、组织文化等多方面共同推进。当前基层办公室仍存在职责不清、信息壁垒、执行偏软等问题,制约着园林事业高质量发展。因此,从园林绿化行业管理实际出发,不断改善办公室协调运转机制,一方面可以提高内部管理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园林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行政支持。唯有持续优化协调机制,强化制度执行,厚植协同文化,才能打通工作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让办公室真正成为高效运转、服务全局的坚强枢纽,为推动风景园林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 结语

综上所述,增强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密切联系。从新征程角度看,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持续推进,有助于各族人民在公共服务中感知国家力量,在共享中深化民族认同,在认同中相互扶持、携手发展,进一步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和向心力。

“投资于人”是一项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它不仅是一项经济政策,更是一项关乎民生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抓手。其本质是将人作为发展的核心与归宿,通过对人的需求满足、能力培育、权利保障等进行系统性投入,夯实人的生存基础、丰富人的生活内涵、激活人的发展潜能,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民生活品质的全方位提升。“投资于人”既契合了人民生活品质从“物质满足”向“精神富足”、从“基本保障”向“品质追求”、从“个体幸福”向“社会共富”升级的时代要求,也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是兼顾“当下生活”与“长远赋能”的战略选择,对于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具有重要意义。

## 一、“投资于人”契合时代需要,回应人民生活品质的升级诉求

新时代人民的生活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鲜明特征,实现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投资于人”精准回应了这一时代需要,为生活品质的升级提供了适配路径。其一,回应“物质富足与精神丰满相统一”的升级诉求。生活品质既要物质富足,又要精神丰满。“投资于人”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保障物质富足,更通过对文化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投入,让人民拥有丰富的文化生活。其二,回应“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融合”的升级诉求。人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生活改善,而是更加追求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投资于人”通过培育人的社会责任感、提升实践能力,让每个人都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参与者,让个人在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获得更高的自我认同。其三,回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升级诉求。“投资于人”通过对人的生态素养、绿色发展理念的培育,大幅提升人的绿色素养,能够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

## 二、“投资于人”提升人力资本,夯实生活品质提升的物质根基

“投资于人”通过培育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激活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为生活品质提升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一,“投资于人”能够培育高素质人力资本,提升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发展质量。通过教育、技能培训、科研投入,培育高素质人才,提升劳动者专业能力,激发人的创新潜能,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突破,提高经济发展的附加值,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让经济发展成果直接转化为人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其二,“投资于人”释放人的发展潜能,促进就业质量提升和增收致富。“投资于人”本质上是对人的发展潜能的投资,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举措,提升劳动者的就业竞争力,让劳动者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更稳定的收入、更完善的劳动保障、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同时,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集聚还能带动新业态、新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机会,拓展人民的生活选择。

## 三、“投资于人”促进社会公平,筑牢生活品质提升的社会基础

“投资于人”是促进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手段,让全体人民都能公平享有发展成果,筑牢生活品质提升的全体根基。其一,“投资于人”保障起点公平,助力社会流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投入,是对人的“发展起点”的投资,可以让不同群体都能享有基本的保障,使得每个人都拥有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生活的机会,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核心前提。其二,“投资于人”补齐发展短板,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而是通过“精准投资”让不同群体都能获得发展支持,从而缩小差距。特别是通过专项保障扶持与能力培育,补齐困难群体的发展短板,使其获得持续上升的潜力与机会。其三,“投资于人”凝聚社会共识,提升治理效能。人们在“投资于人”中获得实惠,感受到发展的公平性,可以增强对社会发展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同时,高素质的公民群体能更加积极地参与治理进程,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生活品质提升。

## 四、“投资于人”彰显制度优势,实现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生活

“投资于人”始终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全民共享高品质生活,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投资于人”始终坚持普惠性、均等性、可持续性,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全体人民都能享有发展成果,而不是让少数人占据发展资源、独享高品质生活。从脱贫攻坚战中贫困地区教育、医疗、技能培训的精准投入,让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拥有了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基石;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民医保全覆盖、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让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再到职业教育提质扩容、创新创业扶持力度加大,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投资于人”始终围绕“全体人民”展开,让生活品质的提升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权利”。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投资逻辑和价值取向,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和“一心一意为人民”的独特优势,让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最终实现让全体人民共同享有高品质生活的目标。这一发展理念,既深刻回答了“为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又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价值指引与实践遵循。

## 结语

总之,“投资于人”的价值意蕴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民生投入或经济要素投入,它既从根本上激活了人的发展潜能,让人民成为自身生活品质提升的主体,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持久动力,为社会公平正义筑牢了基础,精准回应了新时代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多元诉求。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只有持续加大对人的投资,不断完善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技能培训为核心的投入资本培育体系,让投资于人更具普惠性、精准性、可持续性,才能推动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提升,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投资于人」对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价值意蕴

□中共连云港市委党校 程刚